

以“巨眼”¹为中心的明代私家书法鉴藏

张 冰*

内容摘要：明代私家书法鉴藏相比官方鉴藏更加兴盛。主要呈现出了以文徵明、王世贞等几位大鉴藏家为中心的鉴藏交易圈子。本文以文徵明、向元汴、王世贞和董其昌为典型，着重阐述了以他们为中心的鉴藏圈的活动及其文化效应，以期呈现出明代私家书法鉴藏的一个重要特点。

关键词：巨眼 明代 书法鉴藏

一、前言

明中叶前后，随着以文徵明、祝允明为代表的吴门书派崛起，打破了自明初弥漫朝野的台阁之风，明代书法的画面开始变得绚烂起来；继起的华亭诸家以及徐渭、倪元璐、王铎等被书法史叙述冠之以“浪漫主义”的书家群体以极具个性的书风共同推出了明代书法的高潮。同样是自明中叶始，私家书法鉴藏与交易活动随着社会的松动与商品经济的发展而渐趋繁盛，成为了整个社会文化活动中的重要景观。

黄仁宇先生用“死气沉沉”来形容 15 世纪下半期的明代社会，彼时“皇帝对于公共事务很少有大的举措，国家的各种机构设施每况愈下，而宫廷开支却不断上升。”²相比于奢靡无度的宫廷开支，用在维护军事和行政方面的费用对于整个帝国的正常运转才具有直接的破坏力。弘治间，便有多地长时间拖欠军士俸粮的现象；而成化五年，文武官员已逾十万之众，远远高于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汉七千五百员，唐万八千员，宋三万四千员）。入不敷出的惨淡逼迫朝廷采取了减俸、折支，甚至公开卖官鬻爵等措施。自中期以后，政治颓靡、官吏冗杂、国库虚空等等一系列因素综合作用，促使社会发生了很大的变动。穆宗时的“隆庆开关”和万历年张居正改革都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引发了经济结构的变化。在这一变化的过程中，以苏州为代表的江南地区凭藉着优越的地理优势和积淀的经济底蕴与人文传统逐步成为了经济和文化的重镇，也成

* 张冰：男，（1983——），博士，中央财经大学文化与传媒学院书法学专业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书法史。

¹ 一般来说，鉴藏家和好事者的数量是判断一个时段私家书法鉴藏兴盛与否的重要参照，在藏品大量易主流传、藏家相互交流走动过程中，一些着意于此的藏家会逐渐累积起丰富的第一手经验，进而成为鉴藏群体的核心人物，也就是我们常说的“巨眼”；这些具有话语权和公信力的巨眼，一方面能够成为众多藏家与好事者的依靠，另一方面以他们为纽带将鉴藏群体的圈子不断扩大，在频繁的雅集与交易活动中将这一时代的书法鉴藏推向深入。

² 黄仁宇：《16 世纪明代中国之财政与税收》（第二章），三联书店，2001 年 6 月，第 59 页。

为了商业与文化最先交融的区域。

自明代前期始,苏、松、嘉、湖四郡一直是国家赋税最重的地区,随着国家赋税制度的调整和改革,苏州地区³原有的农业经济结构在市镇商品经济的不断刺激下逐步完成了转型,以运河和长江为交通主干线建立起了一套较为完善的市场流通体系。⁴商品经济的繁荣、人口的流动激活了民间文化,一方面把外来的文化因子播种于此,另一方面也将以苏州为代表的南地人文传统推向全国乃至世界。“待到明中叶以后江南手工业和商品经济市镇兴起,民间文化随之而繁兴,取官文化而代之,成为明文化的主体。”⁵此民间文化的典型表现之一便是奢侈之风,苏州的繁华使这种风尚迅速蔓延至周围地区;与此同时,商人的社会地位与日俱增,以区域为代表的行商先后崛起,巨额的财富可以让他们尽情享受润泽的物质生活和社会的尊重。而此一阶段朝廷推行的捐纳制度也为商人改头换面为“仕绅”提供了稳定的渠道;另一端,科举之壅塞迫使很多读书人不得不把基本的生存保障作为首要考虑的问题,而官吏生活之清苦也导致了众多弃儒从商和官吏从商现象的出现。这种情况的直接后果便是士与商之间身份地位的界限渐趋模糊,而这是仕绅阶层所不愿看到的,于是他们极力地思索以何种途径来划清与商人的界限。正如巫仁恕所说:“消费活动的普及,成了社会竞争的场域,促使士大夫以各种形式塑造消费品味,以作为身份区隔的工具。”⁶在无法以金钱和社会地位区分身份的情况下,品味修养便成为了当时士大夫可以倚仗的重要门槛,用今天的话来说,这一门槛属于“软实力”的范畴,不是金钱、地位之叠加可以换取的。于是园林雅致、书画古董、金石鼎彝、斋头清玩乃至锦绮、花果、盆景、文具等等成为了社会上炙手可热的物件,一些尝试跻身仕绅圈子的商人更是不惜倾囊置之。原本在士大夫家居生活中的点缀与寄情之物开始变的细致考究,一时间,社会上流传着大量的介绍雅居生活的书籍,如《考槃余事》、《遵生八笺》、《长物志》、《闲情偶寄》、《格古要论》等等;其中《遵生八笺》甚至被收入了明末流行于市井的日用类书《居家必备》中,此书在明代中后期的多次刊行无疑将这种雅致的奢侈渗入一般市民阶层。针对巨商富贾(当然还包括一些暴发户之类的商人)的介入和模仿,士人们又高呼雅俗之别以应对形式上的趋同:“古物为俗人所玩,物抱奇冤;旨酒为俗人所尝,酒当痛哭;好诗、好书、好文章为俗人所读,诗书文章遭古今一大厄也。”⁷我们也可以从何良俊等人的著录中看到很多士大夫对富商家中珠光宝气的豪奢布置施以讥讽的例子;当然,这种讥讽也伴随着或多

³ 明初,将吴县、长洲、常熟、吴江、昆山、嘉定、崇明七县设为苏州府下辖,弘治间,从昆山等三县划出部分区域设立太仓州,形成了一州七县的格局。

⁴ 关于其时苏州一带商业繁华的盛况可以从黄汴《天下水陆路程》中反映出来:苏、杭聚货段疋外,难以尽述,凡人一身,诸行日用物件,从其所欲皆有。水多,诸港有船,二文能答二十里,一人可代十人劳。御史朱寔昌,端州府人,嘉靖七年,奏定门摊客货不税,苏、松、常、镇四府皆然。于是商贾益聚于苏州,而杭州次之。载杨正泰:《明代驿站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第265页。

⁵ 商传:《走进晚明》,商务印书馆,2014年7月,第202页。

⁶ 巫仁恕:《晚明的消费社会与士大夫》,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202页。

⁷ 张葑:《衍园清语》,载王晔、张潮辑:《檀几丛书二集》(卷三十二),《丛书集成续编》(第八十七册),上海书店,1994年,第773页。

或少的无奈。

在汹涌的商业大潮中，一切物品都变的可以买卖交换。此前那种“书画不可论价，士人难以货取”的局面在明代中后期出现了颠覆性的转变。

明代中期以后，大量内府珍藏流入民间，连同权贵败落之后的散出之物以及民间故藏逐渐激活了私家书法鉴藏；加之社会风气使然，明代中期始，出现了一大批颇有建树的鉴藏家。张应文（张丑的父亲，1524—1585）在《清秘藏》中列举古今鉴赏家，明代便有30人⁸之众，其中居苏州者有23人，这一数字至少将明代私人书法鉴藏的基本状况和地域分布直观的呈现出来，苏州以其强大的区域优势成为当时书法鉴藏的中心。在苏州，前前后后出现了众多鉴藏家，他们之间的平辈交谊，前后提携伴随着江南地区大量藏品的流动易主和各地鉴藏家、好事者辐辏于此，编织了一张巨大的鉴藏、交易网络，影响着社会各个阶层。

二、文徵明：吴门领袖

文徵明（1470—1559）并不像很多鉴藏家或书画家一样具有深厚的家学底蕴，他的高祖以上皆武胄出身，至曾祖文惠才转为业儒事文。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和叔父文森双双进士及第，进一步稳定了文氏家族业儒的方向。二人精意仕途，未遑书画收藏，故没能留给文徵明多少家底⁹。但是文林依靠他的朋友圈子将文徵明引上了文艺之路。在父亲的帮助下，文徵明得以从吴宽学文，从李应祯学书，从沈周学画。这三人彼此交谊深厚，都是当时书画领域的名家，也都在书法鉴藏方面具有非凡的影响力，这种高层次的过从陶染对成就日后的文徵明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吴宽与文林交好，想必教以诗文的同时其家藏苏轼的巨迹也不会对后学吝嗇。李应祯在当时的鉴藏圈子中威望很高，他对一件作品所下的结论往往多为他人所拥护。文林说他“精识古书画，购搨名贤画像及金石书刻，不厌勤剧。”¹⁰他曾带文徵明在吴江史氏家中观摹颜鲁公法帖。此“史氏”为著名鉴藏家史鉴，与沈周是儿女亲家，每逢有客至，则“陈三代秦汉器物及唐宋以来书画名品，相与鉴赏。”¹¹年轻时代的文徵明能够跟从业师游走拜访大鉴藏家，开拓眼界的同时建立宝贵的第一手经验，对文徵明书艺之精进和鉴识之累积影响至深。沈周（1427—1509）也是文徵明成长过程中的一位重要人物。景泰间，沈周的画名便照映一时，各地前来求画者纷然。沈周无意于仕途，一生沉溺在诗画生活之间，“佳时胜日，必具酒肴，合近局，从容谈笑。出所蓄古图书器物，相与抚

⁸ 此三十人为：周宪王、宁献王、徐有贞、李应祯、沈周、吴宽、都穆、祝允明、陆完、史鉴、黄琳、王鏊、王延喆、马愈、陈鉴、朱存理、陆深、文征明、文彭、文嘉、徐祜卿、王宠、陈淳、顾定芳、王延陵、黄姬水、王世贞、王世懋、项元汴、陆会一。由于时代和视阈原因，这一统计于整个明代还并不完全，是我们研究明代鉴藏家的重要参考资料。

⁹ 现存文献可知，文洪尝购得唐人摹本王献之《地黄汤帖》，文林藏有赵孟頫《临智永真草千字文》等。

¹⁰ 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六八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344页。

¹¹ 史鉴：《西村集》（卷首），《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二五九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91页。

玩品题以为乐。”¹²在沈周的交游网中有一批志趣投合者，如李应祜、史鉴、朱存理、徐有贞、陈璠、华理、都穆、文徵明、祝允明等等，形成了以沈周为中心的书画鉴藏圈子，高人雅士，书画商贩、裱褙匠人，熙攘不绝，“（沈周之有竹居）每黎明，门未辟，舟已塞乎其港矣。”¹³正是在这些雅集会友、交易往来的过程中，将书画鉴藏的影响逐步扩大，让文徵明、祝允明等后学晚辈获益良多。沈周的儿子沈云鸿（1450—1502），继承了他的衣钵，好收藏古器物书画，遇到名品便倾囊购之。文徵明与之交好，尝于弘治庚申（1500年）向沈云鸿借观《康里子山自书诗卷》数月并题识，向来精心护理家藏书画的沈云鸿能够给文徵明如此便利，除交情甚笃的因素之外，文徵明的鉴识和书艺水准也是足够过硬的。文氏早在二十二岁为都穆所藏《黄庭不全本》所作的题跋，便开始显示出不同的眼光和学识。此外，苏州王鏊亦是提携文、祝等后进的前辈，他家境殷实、仕途通达，是当时鉴藏群体中的重要人物，其子王延喆、王延陵也常与文徵明等人有赏鉴题识的往来。受益于几位老师的悉心栽培，同辈好友构建起来的鉴藏圈子，再加上文徵明的潜心问学，使他逐步成长为继沈周之后的一位领袖人物。

对于家藏不甚阔绰的文徵明来说，鉴藏群体的交游活动既是进一步延展鉴识的重要途径，也是借以扩大其影响力的必要方式。文徵明三十岁左右时，便与都穆、祝允明、黄应龙、朱凯、张灵、蔡羽等“鉴别法书名画，每有所得，必互相品评以为乐。”¹⁴这些人虽为布衣，然皆以诗文书画之才名世。都穆（1459—1525）曾在史鉴家中做过馆师，所著《寓意编》是当时重要的书画著录之一。他早年从沈周学诗，与文徵明亦有同门之谊，都穆所藏米芾临本《汝南公主墓志铭》便是文徵明从朱存理手中交换而来又转赠于他的。祝允明（1460—1526）是文徵明的故交，也是在明代书坛与文氏并驾之名家。历来对他的描述是以不计生产、奇宕落拓的性格与酣畅淋漓的书风为重心，较少涉及他的鉴藏。祝氏的外公徐有贞和岳父李应祜都是鉴藏圈子中的重要人物，身处这样一个文化环境，祝允明不可能不受沾染。文震孟在《祝京兆先生》中记：“捐产蓄古法书名藉，售者故昂直欺之，弗算。”¹⁵依此判断，祝允明在蓄买法书古籍方面依然显示出了不拘小节的特点，他手中的藏品流动性也很强。过人的书才也让他成为当时艺术圈子的代表人物，与他有过从者不乏大藏家，如黄琳、华夏等。黄琳（约1496—1532）是南京著名的藏家，为宪宗朝宦官藏家黄赐的侄子，与祝允明交谊甚深，尝出晋宋名帖法书示于祝氏，倾动一时的《烟花洞天赋》便是祝允明专门为黄琳所作。华夏（约1495—1568）为无锡收藏家，真赏斋主，《无锡金匱县志》中说他与文、祝二人为性命之交，想必华氏家族的藏品是不会对祝枝山吝啬的。而相比之下，文徵明无论从鉴识、修养和影响力等方面来看更是华夏可以仰仗的“巨眼”高参。华夏出资策划的“有明刻

¹²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十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595页。

¹³ 钱穀：《吴都文粹续集》（卷四十），《文渊阁四库全书》（第一三八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295页。

¹⁴ 文徵明：《文徵明集》（卷二十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1327页。

¹⁵ 文震孟：《姑苏明贤小记》（卷上），《续修四库全书》（第五四一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第370页。

帖第一”——《真赏斋帖》，便由文徵明父子主持刊刻；而且华夏在斥资购入法书名迹之前总要请文徵明定夺，这种往来在避免浪费钱财，保证藏品水准的同时也极大的扩展了文徵明的鉴识。年逾八旬的文徵明曾两次为华夏作《真赏斋图》，以当时文氏之声望，为其绘居所之图亦足见二人之交谊。随着文徵明声名日隆，以他为中心的鉴藏群体也在不断扩大，在这个圈子里，还有华云、陈淳、何良俊、顾从义等，大多为精于书画或赏鉴的名士。他们之间的交往使得更多的法书名迹得以流传，从而促使苏州以外其他地区的书画鉴藏开枝散叶。

三、项元汴：以“天籁阁”为中心的鉴藏流通网络

在奢靡纵乐，俗尚儒雅的社会氛围中，富商以诗文弦诵、书画骨董等为窗口来展示与文人士大夫阶层的文化共识。靠着万贯家资，他们有条件打通各种渠道来搜购大量书画骨董，一些精明的商人起初为避免受骗，会请知名鉴藏家帮忙筛选，随着眼界愈宽，经验愈富，遂练就敏锐的眼力，跻身鉴藏家之列。嘉兴项元汴（1525—1590）当属典型。据《弇州史料后集》载：

（严世蕃）尝与所厚客屈指天下富家居首等者，凡十七家，虽溧阳史恭甫最有声，亦仅得二等之首。所谓十七家者，已与蜀王、黔公、太监高忠、黄锦及成公、魏公、陆都督炳，又京师有张二锦衣者，太监永之侄也。山西三姓，徽州二姓与土官贵州安宣慰。积资满五十万以上，方居首等。前是无锡有邹望者将百万，安国者过五十万。今吴兴董尚书家过百万，嘉兴项氏将百万，项之金银古玩寔胜董，田宅典库资产不如耳。¹⁶

项氏家族能够积聚下近百万的家资主要是靠项铨与项元汴父子的悉心经营和勤俭持家。项铨经营典当业为主，是一位很讲信誉的商人，治生臆算，盈缩不爽。经过他的努力，为项家打下了较为厚实的根基。其三子之中，项元淇与项笃寿均无意于家业，年轻时代的项元汴便开始帮助父亲打理生意。父亲打下的基础可以让项元汴游刃有余的规划家族产业的发展，兄长的“让财于季”避免了因分家产而可能导致的家族混乱，从而给项元汴更集中的力量推动家族产业的拓展。天时、地利、人和，种种因素使得项家成为了富甲海内的豪雄。在项元汴对家族产业的规划中，书画典籍与骨董的收藏无疑是重中之重。项元汴对书画典籍收藏的兴趣来自家庭环境的熏陶，他的父亲项铨已经开始有一些收藏的行为，项元淇潜心于诗文，与很多同道好友结社为欢，尤其是与吴门名士的交游为项元汴拓展自己的鉴藏网络提供了很大的便利。项笃寿于1562年考中进士，授南京考功郎中，后辞官回乡，专意藏书。他的收藏以及交游活动也为弟弟项元汴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基于两位兄长的活动圈子，项元汴拓展出了庞大的书画鉴藏网络，“（向元汴）所与游皆风韵名流，翰墨时望，如文寿承、休承、陈淳父、彭孔嘉、丰道生辈。或把臂过从，或遗书问讯，淡水之谊，久而弥笃。”¹⁷多年的商界淬炼让他对人情世故的洞察和处理早已得心应手，如此便可以往来于诸

¹⁶ 王世贞：《弇州史料后集》（卷三十六），《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五十册），北京出版社，2000年，第2页。

¹⁷ 董其昌：《墨林项公墓志铭》，《容台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七一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507页。

名家具眼之间，求教赏鉴；文徵明父子（尤其是文彭）给他提供过很多重要的帮助。此外，项元汴还不失时机地高价搜购，严嵩父子、韩世能、丰坊、黄琳等大藏家的藏品有相当一部分落入他手；他从安国、陆完、范钦等鉴藏家中也购得了不少法书名绘（亦有交换）；对当朝名家，他主要以交际人情为桥梁来得到他们的馈赠。如此，他的蓄藏规模得以不断扩大，藏品的质量也不断提高。最终项元汴的收藏规模有多大，我们已经不得而知。文嘉尝云：“（项元汴）嗜古人法书如嗜饮食，每得奇书不复论价，故东南名迹多归之。”¹⁸据目前的不完全统计，项元汴收藏过的书画为1428件，其中法书墨迹为644件。¹⁹其中以宋元法书为大宗，宋四家的作品有80件；赵孟頫一个人的作品便达到了80件之多，至少从数目上看，赵孟頫应该是项元汴最为倾意的书家。项氏所为人称道之处不惟数量之巨堪埒御府，其中名家巨迹之数量亦足以傲视群雄，诸如王羲之《远宦帖》（唐摹）、《平安》、《何如》、《奉橘》三帖、《行穰帖》、《快雪时晴帖》、《游目帖》、《万岁通天帖》（唐摹），王献之《中秋帖》、《鸭头丸帖》、《鹅群帖》，褚遂良摹王右军兰亭序，李白《上台台帖》，颜鲁公《湖州帖》、《刘中使帖》，怀素《自叙帖》、《苦笋帖》，神龙本兰亭序，杨凝式《韭花帖》、《神仙起居法》，苏轼《天际乌云帖》、《中山松醪赋》，黄山谷《松风阁诗》，米芾《蜀素帖》、《苕溪诗帖》，赵孟頫《道德经》、《汉汲黯传》、《妙严寺记》，祝允明《古诗十九首》，文徵明《自书诗帖卷》以及《宝晋斋帖》、《保母砖》、《大观帖》、《智永真草千字文》、宋拓《石鼓文》等等。我们如今很难想象贮有这些价值连城的珍迹的天籁阁当初是一番怎样的景象，也很容易理解为何“海内风雅之士，取道嘉禾，必访元汴，而登其所谓天籁阁者”²⁰了。

项元汴的收藏对后世影响之巨远超过我们的想象，有意思的是，其中有两个现象引起了世人的关注，也往往是其为人所诟病之处。其一，项元汴使用过约一百余方鉴藏印记，诸如“项元汴印”、“子京”、“墨林”、“子京父印”、“退密”、“项叔子”、“天籁阁”、“子京珍秘”等等。姜绍书在谈到项墨林收藏时说：“每得名迹，以印钤之，累累满幅，亦是书画一厄。”²¹从个人鉴藏的角度来说，这种行为是可以理解的。项氏于天籁阁中，手捧巨迹，每展一过，兴之所至便钤上几枚印章，一方面表现出了对藏品的宝爱之情，另一方面还满足了其内心的占有欲。彼时，项元汴肯定不会想到千百年之后，他的私人藏品会进入公众视野，因而更不会在意随手拈来的几枚印记会影响法书名绘的形象。其二，在收藏整理众多藏品之时，出于一般商人的职业习惯，项元汴在绝大多数作品上标注了购买价格，即商业贸易中的“进价”，有时还会加注该藏品的市值。很多人都对

¹⁸ 文嘉语，载汪珂玉：《汪氏珊瑚网法书题跋》（卷一），《丛书集成续编》（第九七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9年，第679页。

¹⁹ 此数据参考沈红梅：《项元汴书画典籍收藏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2年3月，第46页。

²⁰ 盛枫：《嘉禾徵献录》（卷六），《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一二五册），齐鲁书社，1996年8月，第357页。

²¹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丛书集成新编》（第五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96页。

此举表达过鄙弃之意，姜绍书说：“复载其价于楮尾，以示后人，此与贾豎甲乙帐簿何异？”²²孙承泽亦批其此举俗甚。孙承泽也将其视为鉴藏行为之可恨者：“（黄庭坚《松风阁诗》）卷佳极矣，而有可恨者……项墨林收藏之印太多，后又载所买价值，俗甚。”²³项氏标注价格是出于商人的本能，还是另有他用，我们无法去揣测²⁴，但他的标注客观上为我们研究明代书画的鉴藏与交易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毫无疑问，项元汴是中国古代最成功的书画商人，其蓄藏规模俨然一个国家级博物馆的水准，在逐渐积蓄的过程中，他以法书名绘为纽带，广泛结交当时的名家巨眼，自己的鉴赏水平也得以不断提升，最终在文人士大夫鉴藏圈子中得到认可，成为了当时最受各地文人士大夫关注的书画鉴藏重镇。可以说，项元汴的财富和热情成全了他的书画鉴藏，并使他从容的完成了由商人向士商混合身份的成功转型。以整个明代鉴藏史而言，项元汴搜求藏品的重要渠道是文人鉴藏圈子，此后，他投桃报李，将家藏悉数示于同道好友及各地慕名而来的赏鉴家，请他们观摩并为之题识。此举一方面更借题识者之名以增藏品之声价，另一方面也为当时有志于斯者提供了优厚的平台，造就了一批文人士大夫鉴藏家。项元汴之后，他的子孙延续了天籁阁的平台功能，这种“项元汴效应”持续的影响着嘉兴乃至整个江南地区的书法鉴藏，董其昌、李日华、张丑等人都曾受到过项氏家族的滋养。

四、王世贞：眼中有神，腕中有鬼

王世贞（1526—1590）出身江南望族，“三世为九卿八座钜富”²⁵，家境殷实，他将很多钱花在了供客及购置图史、山园上面。尽管22岁便高中进士，然而他的仕途随着父亲王忬命运的变化而出现了转折。在其父罹难之后，有感于时局之忧患并家庭变故，出仕之意甚为低落。于是便有了大量闲暇时间交游唱和，著书立说。与江南鉴藏群体的交往便多集中于这一阶段。过目而不忘的异禀帮助王世贞在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都取得了很高的造诣，以“后七子”为标识的文学复古思潮成就了其文坛领袖之地位，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其他方面的声名。《明史》有云：“攀

²² 姜绍书：《韵石斋笔谈》（卷下），《丛书集成新编》（第五十册），新文丰出版公司，1985年，第396页。

²³ 孙承泽：《庚子销夏记》（卷一），《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二六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10页。

²⁴ 若从项元汴的个性来说，这种精细之举不难理解，《五杂俎》载其“纤啬鄙吝，世间所无。且家中广收书画而外，逐刀锥之利，牙签会计，日夜不得休息，若两截人然，尤可怪也。”精打细算，勤俭持家，对自己家族的代表性资产标注投资数额，以建明细账目是一件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了。对项氏此举，古人亦有探讨，朱彝尊云：子京蓄书画甲天下，卷尾必估其价，析产时，按所书以遗诸子，见者以为不爽铢两焉。姜绍书说：不过欲子孙长守，纵或求售，亦期照原直而请益焉，贻谋亦既周矣。以目前的论著看，李万康《编号与价格——项元汴旧藏书画二释》专门讨论了这一问题。

²⁵ 李维桢：《大泌山房集》（卷十一），《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五〇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526页。

龙歿，(王世贞)独操柄二十年。才最高，地望最显，声华意气笼盖海内。一时士大夫及山人、词客、衲子、羽流，莫不奔走门下。片言褒赏，声价骤起。”²⁶与文徵明书坛泰斗的影响力相似，王世贞靠着文坛领袖的声望吸引着一大批高人雅士；加之家产阔绰²⁷亦为其搜藏法书古籍提供了一定的保障。

青年时代的王世贞便开始了与文徵明的交往，在1544年的春天，文徵明偶过王世贞书斋，喜出望外的王世贞拿出家藏的唐人墨迹见示于时年75岁的文徵明，并出佳纸向其索书《前后出师表》，文氏欣然书毕。²⁸此后直到1553年，王世贞因公差回到江南，得以促成了与文徵明的多次往来，这期间，王世贞求得了不少文氏书作，如《行书三诗》等。如此厚爱也让王世贞常常难以释怀，多年之后翻阅之时仍泫然慨之。《停云馆帖》完成之后，王世贞作为《文氏停云馆帖十跋》，成为《停云馆帖》研究的代表论著。王氏此说在当时对于推广《停云馆帖》的影响具有重要意义。在文徵明去世十几年后，应文彭之请，王世贞撰写了《文先生传》，在寄托思念的同时，勾勒出了他心目中的文徵明；尽管他的描述难以为后人所理解，但有人认为王世贞在文坛无可比拟的声望使其笔下的版本于数百年来仍是流传最广的文献。²⁹

大约1553年前后，是王世贞与包括文氏弟子在内的江南名士交往较为频繁的重要阶段，包括张献翼、黄姬水、周天球、俞允文、彭年、陈鏊等。及至1560年，王世贞回太仓为父守丧三载，后又闲居五年，其间开始频繁与吴中名士如张凤翼、钱穀、王穉登、陆治等交往。之后张应文、陈继儒、莫是龙、屠隆等逐渐进入到王世贞的文艺圈子中。在他们的交往中，常以诗文交换对方的书、画作品，其中尤其与故交钱穀和陆治的交往中还夹杂了文人之间的赞助因素³⁰。其时，以张凤翼为首的吴门张氏三兄弟常于“求志园”中邀请名士雅集，其家藏三代鼎彝、古图画、书籍、器玩蔚为大观，王世贞常出入其中，著名的《薛道祖兰亭二绝》便是他从张氏兄弟手中购得。

1566年，王世贞筑“弇山园”闲居会友，有尔雅楼以蓄名人法书及书籍等，至万历年间，王世贞回到太仓，潜心投入到读书治学、书画赏鉴中，此间与文嘉(文徵明之子)过从始密，共同考订赏鉴书画。这些阅历和心得对《古今法书苑》、《艺苑卮言》以及《弇州山人四部稿》(其中有大量题跋)等书学论著的编写具有直接的推动作用。

王世贞早在22岁时便结识了莫如忠(1508—1588)，隆庆三年(1569)，当王世贞赴任浙江参政之时，事先准备好了“礼物”去拜访这位时任浙江右布政使的故友。《崇兰馆集》载：“余雅好

²⁶ 张廷玉等：《明史》(卷二百八十七)，(王世贞传)，中华书局，1974年4月，第7381页。

²⁷ 王世贞家中有大量“质舍”，可以保证其每年取利三十万。

²⁸ 这应该不是二人的初识，王忬尝受人之托为严嵩寻找《清明上河图》，不料因此事而得罪了严嵩最终导致大祸。料想王忬在搜寻名画的过程中应该不会忽略书画鉴藏圈的权威人物，且太仓与苏州本属一域，结识文徵明当在情理之中。

²⁹ 柯律格：《雅债》，三联书店，2012年4月，第205页。

³⁰ 详细可参考 Louise Yuhas《赞助人王世贞》，李铸晋编：《中国画家与赞助人》，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2013年1月。

怀素草书……至是仕浙右辖，王元美以参藩来，出所携诸玩观余，而终及此卷。稍葆笥秘之，期三日而后发。余病弗能往也，元美乃遗余廨中。竟日披对，如握骊珠……”³¹王世贞应该早就知道莫如忠对怀素的草书情有独钟，想必这投其所好之举除了故友间的情谊，更像一种“雅贿”，以此来拉近关系。大概在这一时段，有一位名叫董其昌的华亭后生入莫如忠门下求学（1572年），此后的一段时间，他利用通达的仕途经历与艺术生涯相互支持，终成名高一代的大家。

五、董其昌：篋笥所藏，为时所艳

董其昌（1555-1636）早年所处的时代，江南的书画鉴藏群体由一人独大逐渐成为了三足鼎立之局面，即如张丑所云：“嗣后二美（王世贞兄弟）博访于娄东，子京（项元汴）力购于秀水，一时故楮断麻，云兴霞聚……维时韩存良太史，以妙年登甲，科位帝师，爵元老，兴灭继绝，人文攸系。”³²这种局面的出现是明代私家书画鉴藏与交易发展之必然。

在董其昌早年的经历中，与项氏家族与韩世能的交往对其书画艺术的不断精进以及鉴识的延展起到了关键的作用。项元汴去世的时候，董其昌才36岁，二人属忘年之交。董其昌与项穆（向元汴之子）是同学，因此得以在年轻时代便结识富甲江南的鉴藏界巨擘——项元汴。董其昌81岁时，应项德成（向元汴之子）、项嘉谟（向元汴之孙）之请，作《楷书项墨林墓志铭册》。在文中，董氏回忆了他结识项元汴的过程：“予为诸生时，游樵李，公之长君德纯寔为夙学，以是日习于公，公每称举先辈风流及书法绘品上下千载，较若列看，余永日忘疲，即公亦引为同味，谓相见晚也。”³³项元汴能够放下身段出示藏品，并论书画之渊薮脉络，想必是也看中了董其昌的天分与才学。项元汴去世之后，董其昌便主要与项穆、项德新、项圣谟等来往。一方面董其昌可以有机会观摩项氏藏品；另一方面，当董其昌逐渐声名鹊起之后，他便成为了项氏子弟所依赖的“巨眼”，很多作品还要以董其昌的题识来提高声价。韩世能（1528—1598）一生潜心于收藏，通过搜购、折俸、赏赐等途径积累了大量名迹，名噪一时。张丑（1577—1643）可谓是最了解韩世能家藏的同好，在其专门为韩氏所藏法书而编辑的《南阳法书表》中有云：“（韩世能）生平别无嗜好，绝意求田间舍事，俸薪所入，悉市宝章，晋、唐、宋、元之奇，所收不下百本。多与名流韵士品定甲乙。轴轴连城，言言著蔡。”³⁴时董其昌为庶常，韩世能为馆师，董氏便有机会时时观摹名迹，品第甲乙。在董其昌的相关论著中，常常可以看到“从馆师韩宗伯借”之类的字眼。在多次交往中，董其昌与韩氏之子韩逢禧兴趣相投，及韩世能歿后，董其昌还多次与韩逢禧一同赏鉴书画。以韩氏之藏品看，正与项氏家族所藏形成互补。杨仁恺在《中国书画鉴定学稿》中指出，韩氏鉴藏书画

³¹ 莫如忠：《崇兰馆集》（卷十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〇四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731页。

³² 张丑：《南阳法书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21页。

³³ 董其昌：《墨林项公墓志铭》，《容台集》（卷八），《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一七一册），齐鲁书社，1997年7月，第508页。

³⁴ 张丑：《南阳法书表》，《文渊阁四库全书》（第八一七册），台湾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621页。

的质量当然高出严嵩父子之上，与同时代雄视江南的项子京“天籁阁”的藏品进行比较，难分甲乙。数量上项氏超过韩氏，但精密准确性似有所不逮。自青年时代起，董其昌便可以出入江南最有影响力的两大鉴藏门庭，这一宝贵的经历对其日后的发展以及鉴藏圈子的扩大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在韩氏父子的朋友中，张丑无疑是很有份量的一位，其所编《南阳法书表》和《南阳名画表》在梳理并向世人展示韩氏珍藏之规模的同时，也为后来之研究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在韩世能去世之后，其藏品因韩逢禧宦游南北，不便照料而“遗失数多，零落殆尽”。这种鉴藏史上常见的中道散失更加凸显出了张丑的重要性。出身于鉴藏世家的张丑对艺术品保持着与生俱来的敏感，韩氏父子之外，项氏家族也是他经常造访之地。据张丑《清河书画舫》等文献可知，与张丑交好的主要是项穆、项德新等。在与项氏家族的交往过程中，不仅得到很多直接的赏鉴经验，他还从项家得到了一些藏品，至于是交换或者购买便不得而知了。这也是古代文人比较避讳的话题。于此可见，董其昌与张丑交友圈子的交集很大，二人结识不应该太晚。1615年，易得米芾《宝章待访录》真迹让一向对米芾顶礼膜拜的张丑兴奋异常，他邀请内弟文从简（文徵明之孙）作《米庵图》并跋，还请董其昌在卷首题“米庵”二字。

董其昌的朋友中，交谊最密者当属陈继儒（1558—1639），二人为同乡，“少而执手，长而随肩”，至晚年亦毫无间言。董其昌曾筑“来仲楼”招陈继儒至此调养心性，赏玩书画。即便是当董其昌为官，陈继儒隐居之时，二人也从未间断过来往；他们常为对方所藏书画题识，并一同到韩宗伯、项德新、曹周翰等友人居所去观摹法书名绘。董其昌去世之后，老友陈继儒为其料理后事。陈继儒在科考失利之后，便开始了将近二十年的坐馆授书生活，其间，尤其是在王世贞、项氏家族讲学的经历对其鉴识和交友圈子的拓展都有很大的帮助。当时的项氏家族在鉴藏界的声望很高，即便是在项元汴去世之后，在项氏子弟周围也聚集着很多鉴藏家及好事者。味水轩主人李日华（1565—1635）的族兄李培随侍项元汴几四十年，这一关系为李日华结识项元汴提供了很大的便利；李日华与项德新又同问学于冯梦禛（1546—1603），与项穆、项孟璜有过从，这一段经历在其书画鉴藏生涯中至关重要。李日华很早便结识了陈继儒，从陈氏学毛诗，此后二人常有诗文书画方面的交流，陈继儒常常会造访味水轩索观书画。在1616年，三十五卷《晚香堂苏帖》完工之后，陈继儒随即过味水轩征求李日华的意见。李日华的老师冯梦禛也是杭嘉一带有名的鉴藏家，因收藏王右军《快雪时晴帖》而取书斋为“快雪堂”。1595年，董其昌初致书冯氏欲借观王维的名迹，冯梦禛以得到董书为乐，故欣然与之。此后二人多有往来，董其昌与杭州文人鉴藏群体的交往多以冯梦禛为纽带。

为了更多的观摹甚至得到上乘的法书墨迹，董其昌与一些巨富徽商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徽商的代表人物吴廷曾携米芾名迹《蜀素帖》至西湖与董其昌交换，这次交易董其昌付出了不小的代价，使《蜀素帖》得以归入明主而声价俱增。此外，在《容台集》中还出现过很多请董其昌鉴赏并题跋者，其中亦不乏名家，如项德新、冯梦禛、汪柯玉、黄元、王肯堂、吴廷、冯詮等等。董其昌凭借其巨大的社会影响力在这样一个庞大的鉴藏群体中处于核心地位，依靠各种关系来观摹

赏鉴古代名家巨迹，在游历、社交的过程中想方设法去交换、搜购心仪的藏品。

六、结语

明代，在士大夫之间流行着一种观念，即学文胜于学诗，学诗胜于学书，学书又胜于学画，这四种才能是可以垂名法后的。然以实际的社会效应考量，相比于科举考试需要的诗文技能，无论是收藏古代的法书名绘，还是以能书善画而博取润例，都更容易给士人带来实惠。更进一步，书画艺术作为文人士大夫群体标志性的修养至明代中后期已经泛化到整个社会的日常生活中，以古今书画之鉴藏、名家书画润例、社交人情之媒介以及闲居（包括一般民居）生活之点缀等诸多形式流行于社会的各个层面。

这几位巨眼之中，除向元汴身份略有特殊之外，其余三人亦皆以善书名噪一时，他们很好的将鉴藏经验与自己的书风建构相融合；项元汴则更多以其“天籁阁”为重要场域，为项氏家族的文化产业以及书画鉴藏与流通留下了浓重的一笔。如此，在几位巨眼鉴藏家的带动之下，相应的鉴藏群体得以不断扩大，其社会文化效应亦随之宏阔。他们把明代书法鉴藏推向了新的宽度和深度，眼界的开阔重新激活了书法审美观照，在更多的思考和变化中，明代书法史也逐渐呈现出了色彩斑斓的一面。

『或問』投稿規定

- 投稿資格は、近代東西言語文化接触研究会会員（入会は内田、又は沈まで）。
- 投稿論文は、原則として未公開の完全原稿とし、電子テキストとプリントアウトの両方を提出する。原稿は返却しない。
- 執筆者による校正は、二校までとする。
- 投稿論文は、本誌掲載後、他の論文集等の出版物への投稿を妨げない。
- 原稿作成に当たって、『或問』「執筆要領」を厳守する。
- 原稿料は支払わないが、雑誌を格安価格で提供する。

『或問』執筆要領

1. 使用言語は、日本語、英語、中国語とする。
2. 字数は、16,000字（400字詰め原稿用紙40枚）までとする。
3. 簡単な要旨（原稿と異なる言語による）を付する。
4. 投稿は、所定のフォーマットを用い、表などは極力避ける。フォーマットは、沈国威までご連絡ください。
5. テンプレートを使用しない場合、テキストファイルの形で提出する。
6. 論文中に中国語などを混在させる場合、Windowsは、微軟Pinyin2.0（簡体字）、微軟新注音（繁体字）を用いること。
7. 注は、脚注を用い、文章の行中に（注1）のように番号を付ける。
8. 参考文献は、下記の体裁で脚注に付けるか、或いは文末に一括して明示すること。

（単行本）

或問太郎、『西学東漸の研究』、大阪：しずみ書房、2000年10-20頁
 Bennett, Adrian A. *John Fryer: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to Nineteenth-century China*. Cambridge, Mass.: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67.

（論文）

或問花子、「東学西漸の研究」、『或問』第1号、2000年2-15頁
 Fryer, John. "Scientific Terminology: Present Discrepancies and Means of Securing Uniformity." *Records of the General Conference of the Protestant Missionaries of China Held at Shanghai, May 7-20, 1890*, pp. 531-549.

9. 本文や注の中で、文献に言及するときには、或問太郎（2000:2-15）のように指示する。同一著者による同年の論著は、2000a、2000bのように区別する。

内田慶市 (u_keiichi@mac.com)
 沈 国威 (shkky@kansai-u.ac.jp)